



文艺研究新视野

HUAYU SHIJIAO DE WENXUE WENTI YANJIU

话
语
视
角

的文学问题研究

高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高玉◎著

HUAYU SHIJIAO DE WENXUE WENTI YANJIU

；
话
语
；
视
角

的文学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高玉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9

ISBN 978-7-5004-7869-0

I. 话… II. 高… III. 文学理论—研究 IV.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0256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guoxiaohong149@163.com)

特邀编辑 郭 馨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华审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31.5 插 页 2

字 数 483 千字

定 价 5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提起五色石，有谁不想到它源自中华民族借一位创世女神之巨手，谱写出的那篇天地大文章？一两千年前的汉晋古籍记载了这个东方民族的族源神话：当诸多部族驰骋开拓、兼并融合而造成天倾地裂，水灾火患不息的危难时刻，站出了一位曾经抁土造人的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淮南子·览冥训》），重新恢复和创造天行惟健，地德载物的民族生存发展的空间。在烈火中创造自己色彩的五色石，凝聚了这种天地创生，刚健浑厚的品格，自然也应该内化为以文学—文化学术创新为宗旨的本书系的精神内涵和色彩形态，探索一条有色彩的创新之路。

经由“天缺须补而可补”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其缺者的大与圣，其补者的仁与智，无不可以引发创造精神和神思妙想的大爆发。何况人们又说女娲制作笙簧，希望在创造性的爆发中融入更多美妙动人的音符？李贺诗：“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歌咏的是西域乐器箜篌，朝鲜平民乐曲《箜篌引》，可见精神境界之开放，诚如清人所云：“本咏箜篌耳，忽然说到女娲、神妪，惊天入月，变眩百怪，不可方物，真是鬼神于文。”（黄周星《唐诗快》）创造性思维既可以正面立意，又可反向着墨，如司空图《杂言》：“乌飞飞，兔蹶蹶（乌与兔是日月之精），朝来暮去驱时节。女娲只解补青天，不解煎胶粘日月。”当然也可以融合多端，开展综合创新，如卢仝的古体诗：“神农（应是伏羲）画八卦，凿破天心胸。女娲本是伏羲妇，恐天怒。捣炼五色石，引日月之针，五星之缕把天补。补了三日不肯归婿家，走向日中放老鸦，月里栽桂养虾蟆。”这就把伦常

幽默、月宫神话，也交织到炼石补天的神思中了。更杰出的创造，是把炼石补天神话的终点当作新起点的创造。这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把女娲炼石补天时被弃置的一块顽石当作通灵宝石，带到人间走了阅尽繁华与悲凉的一遭，写成了“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的“天书”与“人书”相融合的精神启示录。由五色石引爆的这些奇正创新、综合创新和跨越式原始创新的丰富思路，应该成为我们书系的向导，引导我们进行根底扎实，又五彩缤纷的学术探索，或如宋朝一位隐居黄山的诗人所云：“我有五色线，补袞袞可新；我有五色石，补天天可春。”（汪莘《野趣亭》）

我们处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世界视野空前开阔，创新欲望空前旺盛，学理思维空前活跃。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思想学术文化已经以其无比丰厚的成绩走入了一个新的纪元。但我们也迎接着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扑面而来的机遇中的严峻挑战。高科技对文学生存方式的强势介入，市场机制对文学生产的批量性推动，消费时尚对文学潮流的极端吸引，以及网络、图像参与其间的新媒体文学表达形态，包括林林总总的电视文学、摄影文学、网络文学、手机文学、图说文学等形态的火爆滋生，令人深刻地感受到今日之文学已远非昔日之文学了。对于原有的文学格局、形态和秩序而言，这里所面临的泛化性的消解和创新的包容的挑战，严峻地考验着当今学术界的学理担当能力。如果说在某些领域，在某种程度上，也出现了一些与女娲神话类似的“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的危机，大概也不应被看做是危言耸听吧。那么，又从哪里找到补苍天的五色石，立四极的鳌足和止淫水的芦灰呢？若能够由此写出女娲炼石补天的新篇，也是本书系不胜翘首企盼的。

令人满怀信心的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百摧不磨，往往在艰难的挑战中出现超强度的爆发，在爆发中显示了坚毅的魄力和深厚的文化元气。浩瀚雄厚的多地域多民族的历史文化资源和现实文化实践，成为它层出不穷地为人类提供文化经验和创新智慧的不竭源泉。且不说旷世莫比的少数民族神话，即便中原神话虽未衍化为长篇英雄传奇，却散落为遍地开花的民俗奇观。五色石在历朝志怪和许多地理志中，屡有记载，女娲庙

在甘肃秦州有，湖北房州也有。女娲抟土造人处据传在汉武帝《秋风辞》吟咏的汾阴，女娲墓则在九曲黄河最大的弯曲处古潼关附近的风陵渡，因为女娲风姓，风陵也就成了娲皇陵了。中华民族是把自己的母亲河和这位创世女神连在一起的。五色石散落之处有广东产端砚的山溪，《元丰九域志》云：“端溪山有五色石，上多香草，俗谓之香山。”明代诗人说：“女娲炼馀五色石，藏在端溪成紫霞。天遣六丁神琢砚，梦中一笔夜生花。”（张昱《题端古堂》）既然五色石散落岭南，那么炼石的灶口在哪里？在太行山。明人陆深《河汾燕闲录》说：“石炭即煤也……（山西）平定所产尤胜，坚黑而光，极有火力。史称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天，今其遗灶在平定之东浮山。予谓此即后世烧煤之始。”五色石通过创世女神之手，成为一种天地交泰的文化生命结晶，它一头联结着赋予人类生存以温暖的“坚黑而光”的能源，另一头联结着文化创造的“梦笔生花”的灵性。在如此浩瀚无垠的天地、人类、历史、文化空间进行新世纪的文学学术创造，尽管阅尽风云变幻的价值重建、形式变换和文学边界模糊，但我们的民族也有足够的底气、智慧和能力，在文学研究中注入充满活力的人类审美本性的精髓，从中焕发出现代大国思想文化的独立品格和创新气象。

明诗有云：“五色石堪炼，吾将师女娲。”（周瑛《至广德作东园书室》）是我们全面、系统、深入地调动浩如烟海的文化资源和创新智慧，拓展新视野，提出新命题，给出新阐释，师法女娲炼石补天的原始创新行为，炼造出一个东方现代大国的思想学术的五色石的时候了。

杨义

2008年6月1日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语言与话语	(3)
第一节 现代语言本质观研究路向及检讨	(3)
第二节 语言的“工具性”和“思想本体性”及其关系	(12)
第三节 语言的三个维度与文学语言学研究的三种路向	(24)
第四节 “话语”及“话语研究”的学术范式意义	(39)
第二章 “现代性”作为话语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64)
第一节 论“现代性”作为话语方式的言说性及其特点	(64)
第二节 “现代性”作为话语方式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及其限度	(83)
第三章 古代汉语的“诗性”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性”	(98)
第一节 《关雎》为什么不能“今译”	(98)
第二节 古诗词“今译”作为“翻译”的质疑	(130)
第四章 重审文学“翻译”作为话语及其对文学研究的意义	(148)
第一节 “忠实”作为文学翻译范畴的伦理性	(148)
第二节 论两种外国文学	(161)
第三节 翻译文学在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关系中的 中介性	(172)

第四节	论翻译文学的“二重性”	(185)
第五节	重审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地位	(196)
第五章	超越与比较——中西文论话语比较研究意识论	(217)
第一节	中西比较诗学的“超越”意识	(217)
第二节	“精确”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批评话语的语义分析	(225)
第三节	当代比较诗学话语困境及其解决路径	(234)
第四节	重建中国现代诗学话语体系	(245)
第六章	论“懂”作为文学欣赏理论话语	(259)
第一节	论中国古代文学欣赏的非“懂”性	(259)
第二节	“懂”作为现代文学欣赏基本方式的理论基础	(273)
第三节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反懂”的讨论及其理论反思	(280)
第四节	反“懂”的文学欣赏	(300)
第五节	当代中国文学欣赏中的“反懂”性	(320)
第七章	“个人”与“自由”话语的形成及其对文学研究的意义	(341)
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个人”话语及其本质	(341)
第二节	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其近代意义	(350)
第三节	从个体自由到群体自由——梁启超自由主义思想的中国化	(361)
第四节	选择、吸取与演变——论中国现代“自由”话语的建构	(379)
第五节	中国近现代个人主义话语及其比较	(392)
第六节	“个人”与“国家”的整合——中国现代文学“自由”话语的理论建构	(408)
第七节	中国现代“自由”话语与文学的自由主题	(424)
第八章	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话语言说	(441)
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性	(441)

第二节 民族文学理论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	(452)
第三节 论全球化与民族文学生存境遇及其言说	(462)
参考文献	(471)
附：本书中已经发表的文章目录	(484)
后 记	(487)

序

高玉 2001 年到四川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学科做博士后，我是他的合作导师。《“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就是在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

高玉的博士是在华中师范大学读的，师从黄曼君先生。博士论文《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主要从语言的角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出版以后很有影响。他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仍然是从语言的角度研究文学，主要是从话语的角度研究文学和文学理论问题，比较文学是一方面，但也涉及到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等。他博士后出站报告最初的题目叫《文学理论话语研究》，似乎也是切题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得到了老师们一致的肯定，认为具有开拓性，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观点，比如关于“反懂”这个概念就是作者总结出来的，他把它提升成一个文学理论范畴，能够很好地解决当代文学欣赏中的一些问题，也可以说是文学中晦涩现象的一种新的言说。

著作在结构和思路上都很有特色。从目录来看，似乎很散，有点“四不像”，很难归属，既不属于纯粹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也不属于现当代文学或者文学理论等。一会儿古代，一会儿现代，一会儿中国，一会儿外国，比如“个人”与“自由”的这一章，从中国古代讲到中国近现代，从历史、哲学讲到文学，问题很集中，但时间和学科跨度很大。书中的章节绝大多数都已经发表，发表的杂志和“栏目”更是五花八门，有的发表在文学栏，有的发表在哲学栏，有的发表在语言栏，有的发表在历史栏，属于文学的文章有时属于外国文学，有时属于文学理论，有时属于比较文

学，有时属于现当代文学，有时还属于古代文学。关于著作的“散”“问题”，记得当时出站座谈时就有老师提出来过，当然表达得很委婉，说这种写法在结构上过于开放。

但这里我要为高玉作些辩护。我觉得，按照传统的学科标准和学术规范，这本书的确很散，但它有内在的统一性，这内在的统一性就是方法或者视角，具体地说就是“话语”的方法和视角，该书实际上就是“话语”研究，既探讨“话语”本身，也探讨文学和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具体话语以及这些具体的话语对文学发展的制约和影响。有点近于“关键词”研究。我不知道这是否称得上是一种新的学术方式，也许它能够对我们当今的学术“范式”造成一些冲击，至少提醒我们应该反思当代的学术范式。作者在第一章对于“话语”范式与传统的“认识论”范式和“本体论”范式之间的区别有详细的论述，按照这种区别，我的理解，本书具有明确的理论体系性，只是这种理论体系不同于“本体论”和“认识论”范式的理论体系。章与章之间的问题缺乏明显的关联，但具有内在的逻辑性。作者的目标似乎是显示“话语”范式的特点及其意义。

我多年来关注话语问题，我感觉高玉的著作有很多新的东西，既有方法和学术思路上的，也有观念上的，和我们过去的学术在做法上有很大的不同。没有学科界线，他自己称之为“跨文学研究”。我不知道这种做法究竟有多大前景，但我知道，这种研究是非常艰难的，可能会吃力不讨好，对于现代学术体制培养的学者来说，这种研究似乎很难让人接受。所以这种学术方式能否被学术界认可，我真的不敢肯定。我想著作出版之后可能会有些争议，我希望有讨论。但我现在想说的是，我们应该鼓励这种探索和尝试。

高玉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把学术看得非常重。这么多年来，他心无旁骛，一心一意做学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很为他感到高兴。祝愿他取得更大的成绩。

曹顺庆

2009年6月27日于四川大学

第一章

语言与话语

第一节 现代语言本质观研究路向及检讨

语言问题是现代学术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它对现代哲学、文学、历史等各个学科都有深刻而深远的影响。但现代语言研究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主要是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之间的分裂与隔膜。我们看到，当代语言研究明显表现出两种不同的语言本质观以及相应的研究趋向和路径。语言学基本上持语言工具观，所以主要是在形而下的层面上研究语言，而语言哲学则基本上持语言思想本体观，所以主要是在形而上的层面上研究语言。两种研究既没有冲突，也缺乏交流与融合，各在自己的领域内沿着各自的方向展开。不同的问题意识和不同的研究路径以及相应的不同语言本质观，不仅明显地表现在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研究之中，在语言哲学内部，也大略表现出这样两种不同的倾向。

但语言本身并不具有这样一种分裂性，问题出在我们对语言的研究和认识。

那么，语言学关于语言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路径合理性在什么地方？问题又在什么地方？语言哲学关于语言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路径合

理性在什么地方？问题又在什么地方？语言本质工具论有什么合理性？又存在什么缺陷？语言本质思想论有什么合理性？它又存在什么缺陷？语言学的语言本质观和研究方法与语言哲学的语言本质观和研究方法能否整合？本节将通过对于当今语言本质观研究的现状进行描述和分析来回答这些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初步设想。

综观当今的语言问题研究，我们看到，实际上存在着三个领域的语言研究。

一、语言学领域的语言研究。这是职业的语言学研究，包括研究文字、语音、语法、词汇等，就中国来说，主要包括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普通语言学三个二级学科。其中，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主要是对语言现象的规则进行总结，包括词义的释训，总体上来说具有技术性。而普通语言学则研究语言规律，既研究语音、语法、构词规律，也研究语言的性质，研究语言与思维、语言与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而这后一点则具有哲学的意味，和语言哲学比较接近。但总体上，在中国的语言学中，语言的起源、语言的本质、语言与思想思维之间的关系、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等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深入的追问，这种研究在中国语言学中是另类的，因而是被排挤的，其研究成果也很难在专业的语言学研究刊物中展示出来。语法、语音包括方言的研究则是正宗或者说主流的语言学。

与中国的语言学不同，西方的语言学则明显地表现出重语言技术性与重语言思想性的二分倾向，这两种倾向既表现在不同的语言学家之间，也表现在同一语言学者的不同研究之中。这种分裂具有很深的历史根源，事实上，19世纪以来，西方语言学研究就明显表现出这两种不同的趋向和路径。比如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就重语言规则研究，而萨丕尔的《语言论》则重语言规律研究。洪堡特既研究语言的具体问题，也抽象地研究语言的文化思维问题，前者代表性著作如《论某些语言中方位副词与代词的联系》；后者代表性著作如著名的《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索绪尔也这样，早期的索绪尔主要讲授哥特语、希腊语、拉丁语、梵语等具体的语言，后来由于偶然的机会才讲授“普通语言学”，其《普通语言学教程》明显具有哲学化的倾向，对后来的结构主义诗学影

响巨大。其他如雅柯布森、乔姆斯基等其语言学研究都表现出非常复杂的情况。总体来说,外国语言学基本上是“重语言技术”与“重语言思想”平分秋色,并且在各自的领域发生方向不同的影响。当今西方语言学不过是沿袭了这样一种格局。

二、外语领域的语言研究。外语作为学科,在中国具有特殊性。中国的外语系作为机构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的“同文馆”和“广方言馆”,其初与工商等专业具有同样的性质,是一门具有实用性和技艺性的学科。实用性和技艺性至今仍然是外语专业的最重要的特征,所以,对外国语言的“听”、“说”、“读”、“写”作为熟练的技能仍然是外语学习的最重要甚至是终极目的。但另一方面,随着外语作为学科的长期建构和积淀,外语的人文性越来越强,从简单的语言学习开始,外语专业越来越走向对外国语言和文学的研究。在这一意义上,外语界对于语言的研究是从对外国语言的“教”和“学”而切入的。

总体来说,外语界对于语言的研究也大致在语言的工具性和语言的思想性这两个层面上展开。从教学的角度对语音、语法、词汇规则的研究,这是典型的语言技术研究,具有形而下性。而从语言的角度研究外国文学、外国文化,研究外国语言与外国思想之间的关系,这是语言哲学研究,具有形而上性。特别是随着对于翻译的深入追问,研究翻译的跨文化性、跨语际性,以及这种跨越性对本土文化、文学和语言思想的影响,这和语言哲学比较接近。所以,外语学界的语言学研究也表现出分裂的状况。

三、哲学领域的语言研究,即语言哲学研究。语言哲学也明显二分,即以分析哲学为主体的语言哲学,和以现象学、解释学、结构主义为主体的语言哲学,前者重具体语言问题分析,具有技术性,后者则更多地抽象地谈论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以及思想和观念问题的语言论基础。与语言学不同,语言哲学是从哲学的角度切入语言问题的研究,或者说追问哲学问题追溯到语言这里,研究语言不是语言哲学的终极目的,其终极目的仍然是哲学问题或者说思想问题。

检讨当今的语言问题研究,我们看到,不论是语言学、语言哲学还是

外语教学与研究，它们对语言的研究都存在着片面性，片面的根源在于语言本质观的偏执，它们或者把语言看做是一种工具，只研究语言的技术性而忽略或否定语言的思想性，或者把语言看做是一种思想而忽略或否定语言的工具性。我们看到，语言学越来越成为语言技术学，语言学家越来越成为语言技术家。语言学满足于对语言事实的归纳和总结，而不追求解决思考的问题，不研究概念及意义，不研究语义问题，不研究语境问题，对于词汇缺乏思想层面的反思，这是有疑问的。语言的根本价值就在于它对人有意义有价值，所以，我们应该从意义和价值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特别是要从思想的角度来研究词语，要研究思想概念以及这种概念对于人类思想演进的作用，陈嘉映说：“概念是研究的向导；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就会立刻迷失在无穷繁多的形态同异之中。我们把含有 ai 音的句子归成一类，这在形态上是相当清楚的，然而没有任何概念内容，没有任何意义。”^①但事实上，我们看到，当代语言学中，语言的例子大多都是日常用语，语料都是从日常生活、文学作品、新闻报道中来。对于概念，我们更关注的是物质名词而不是思想名词，对于思想史的“关键词”更是少有研究，完全把它们交给了语言哲学。我认为，语言学拒绝对现代思想词汇进行研究，这是片面的，它只能研究语言在“形而下”层面上的规律，而不能研究语言在“形而上”层面上的规律。我认为，重视思想语言将会给作为学科的语言学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将会使语言学向哲学敞开大门，从而使语言学的天地变得更宽广。

事实上，20 世纪语言哲学正是从这里切入，对哲学和思想问题展开语言研究，被称为“语言论转向”。20 世纪哲学“语言论转向”的根本原因是语言本质观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这种颠覆被称为“哥白尼式的革命”。

而在语言哲学和思想领域，实际上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趋向和路径，表现出不同的问题意识。这两种研究路向同样存在着它们各自的优点和缺点，检讨语言哲学主要是西方语言哲学研究关于语言本质的观点，对于我们反思语言研究和认识语言的本质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① 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0 页。

对于语言哲学，在名称上向来存在着分歧。在英语中，表示语言哲学的有两个基本词汇：“philosophy of language”、“linguistic philosophy”，还有一些变种，比如“philosophy of linguistics”，这里关键的词有两个，一是“language”，二是“linguistics”，前者泛指语言，后者则指具有技术性的语言学，所以，我们通常把“philosophy of language”翻译成“语言哲学”，而把“linguistic philosophy”翻译成“语言学哲学”。linguistic philosophy“对意义、同义词、句法、翻译等语言学共相进行哲学思考，并且对语言学理论的逻辑地位和验证方式进行研究。因此，语言学哲学是科学哲学的特殊分支之一，与物理学哲学、心理学哲学等并列。”而 philosophy of language“可以留下来称呼语言哲学原初领域剩余的那些部分，包括关于语言的本质、语言与现实的关系等内容的或多或少具有哲学性质的论著。沃尔夫的《语言、思想与现实》，也许还有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①当然，也有相反的约定，比如徐友渔说：“大致说来，我们可以作如下区分：语言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一个领域，它研究语言与实在的关系、意义的性质、真理概念、言语行为等问题。语言学哲学（或称为‘语言分析’）不是哲学的分支而是一种哲学方法，它对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等领域中所用的概念进行分析。”^②

区分“语言哲学”与“语言学哲学”其实是很重要的，“语言哲学”与“语言学哲学”实际上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语言哲学研究的路径和倾向。语言哲学上把这种不同称为“英美传统”与“德法传统”^③，或者称之为“分析哲学传统”与“现象学—解释学传统”^④。前者以弗雷格、罗素、奥斯汀、蒯因、克里普克等人为代表，后者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人为代表。

两者的研究也根本不同，前者研究语言中的哲学问题，比如指称、真

① 万德勒：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转引自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② 徐友渔：《“哥白尼式”的革命》，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序言”第3—4页。

③ 参见徐友渔等著《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德法传统比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前言”第335页。

④ 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理、语义、摹状词、言语行为、句子、人工语言等，非常专业，需要系统的学习才能进入。后者则可以说是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哲学问题，特别是研究语言与思维、思想之间的关系。胡塞尔从语言的角度研究逻辑，海德格尔从语言的角度研究“存在”。“英美传统”研究的语言既包括哲学语言，也包括日常语言，其中以日常语言为主，有大量的语言实例；而“德法传统”研究的语言主要限于哲学，即具有思想性、抽象性的语言，又因为他们认为语言具有整体性，是一个系统，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以具体的语句为例来说明问题，他们只讨论具体的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比如海德格尔讨论“是”、福柯讨论“性”、德里达讨论“结构”、利奥塔讨论“合法性”，他们确实是在语言的层面上讨论这些“词”，但海德格尔的“是”已经不同于弗雷格、罗素等人的“是”，前者属于哲学命题，后者属于语言分析的“句法”。

正是因为对于语言研究的不同的问题意识和不同的路向以及不同的选取对象，所以在语言本质问题上，“英美传统”与“德法传统”表现出不同的观点。总体来说，“英美传统”与语言学的观点比较接近，虽然他们也研究语言与现实的关系，认为很多哲学问题从根本上是语言问题，可以通过语义分析终极性地解决，但他们总体上认为语言是对事物和思想的命名，具有工具性。维特根斯坦曾说：“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① 维特根斯坦这个判断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分析哲学传统”的特点，一方面，他们强调语言对于哲学的绝对意义，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调语言背后有一种“事情”，只是有的“事情”是透明的，有的“事情”是不透明的，因而有的“事情”可以被言说，有的“事情”不能够被言说，说到底，还是“事情”决定语言。这样，“分析哲学传统”的语言观就具有逻辑经验主义的特点。而“德法传统”则是比较鲜明的语言思想本体论，他们认为语言就是思想本身，而不承认语言背后还有思想，或者思想可以脱离语言而赤裸裸地存在。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语言是存在之家”，“人诗意地栖居在语言之中”。“唯有词语才让一

①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0页。